

列 宁

怎 么 办？

第 二 分 册

人 民 出 版 社

三

工联主义的政治和 社会民主主义的政治

我們还是从夸奖“工人事业”杂志开始吧。馬尔丁諾夫在“工人事业”杂志第10期上，发表了一篇論述与“火星报”的意见分歧的文章，标题为“揭露性的刊物和无产阶级的斗争”。他把这些意见分歧的实质表述如下：“我們不能只限于揭露阻碍它(工人政党)发展的制度。我們还应当对无产阶级的各种最近的日常的利益有所反应。”(第63頁)“……‘火星报’……实际上是革命反对派的机关报，它揭露我国的制度，主要是政治制度…… 而我們现在和将来都要在与无产阶级斗争保持密切的有机联系的前提下为工人的事业努力”(同上)。馬尔丁諾夫說出这一段話来，我們不能不表示感謝。他这一段話具有重大的概括意义，因为它实质上决不仅仅是概括了我們同“工人事业”杂志的意见分歧，而且概括了我們同“經濟主义者”在政治斗争問題上的一切意见分歧。我們已經指出过，“經濟主义者”并不绝对否认“政治”，而只是常常从社会民主主义的政治观滑到工联主义的政治观上去。馬尔

丁諾夫也正是这样滑下去的，因此我們也就同意選擇他作为經濟主义者在这个問題上的錯誤的**典型例子**。我們往下就会証明，無論“‘工人思想报’附刊”的作者們，或“自我解放社”宣言的作者們，或“火星报”第12号上所載的那封經濟主义者的来信的作者們，都是沒有理由因我們选定馬尔丁諾夫而責备我們的。

(一) 政治鼓动以及經濟派 縮小政治鼓动的观点

大家知道，俄国工人經濟^①斗争的广泛发展和巩固的过程，是和經濟方面的揭露(工厂方面和职业方面的揭露)“刊物”的创办工作同时并进的。“传单”的主要内容是揭露工厂中的情形，于是在工人中間很快地激起了从事这种揭露的真正热情。工人們一看见社会民主党人小組愿意而且能够供給他們一种叙述他們的貧困生活、无比艰苦的劳动和无权地位的种种实际情况的新传单，就紛紛写起工厂通訊来。这种“揭露性的刊物”不仅在某一传单所揭露的那个工厂里发生很大的影响，而且在所有听到揭露出来的事实的工厂里都发生很大的影响。既然各个企业和各种职业的工人們的貧困和痛苦有許多相同

^① 为了避免誤会，我們要說明一下：在以后的叙述中，所謂經濟斗争(按我們所习惯的用詞法)全都是指“实际的經濟斗争”而言，在上面所举的引証中，恩格斯称这种斗争为“对資本家的反抗”，而各自由国家里的人們則称它为工会的、工团主义的或工联主义的斗争。

的地方，“叙述工人生活状况的实话”也就激动了**所有的工人**。甚至在最落后的工人中间，也产生了一种想“发表一下”的真正热情，一种想用这种萌芽形式的战争去反对建立在掠夺和压迫的基础上的整个现代社会制度的高尚的热情。这种“传单”在绝大多数场合下都真正成了一种宣战书，因为这种揭露工作起了极大的激励作用，使工人一致要求消灭各种令人发指的丑恶现象，并且决心用罢工来支持这种要求。结果，厂主自己也不得不承认这种传单是一种宣战书，往往不愿等待战争本身的到来。这种揭露性刊物，照例是一经出现就成为强有力的东西，发生强大的精神压力。往往只要有传单出现，就可以使一切要求或一部分要求得到满足。总之，经济方面的（工厂方面的）揭露工作，过去和现在都是经济斗争的重要杠杆。只要必然使工人起来进行自卫的资本主义还存在，这种揭露工作是始终会保持这种意义的。现在在最先进的欧洲各国，也还可以看见这样的情形，就是对于某一个偏僻的“行业”里或某一个落后的家庭手工业部门里种种丑恶现象的揭露，可以成为唤起阶级觉悟、使工会斗争开始进行和社会主义开始传播的起点^①。

^① 我们在本章中所讲的只是**政治斗争**，较广义的或较狭义的政治斗争。所以我们只顺便指出，“工人事业”杂志非难“火星报”“过分避讳”经济斗争，这不过是一个笑柄而已（“两个代表大会”第27页；马尔丁诺夫在他所写的“社会民主党和工人阶级”这本小册子中也再三重复过这种非难）。假使提出这种非难的先生们把一年来“火星报”上的经济斗争栏的篇幅用普特或印张（这是他们所爱用的方法）计算一下，并且把它拿

近来，絕大多数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几乎是把全副精力用在这种組織揭露工厂情形的工作上面。只要回想一下“工人思想报”就可以知道，人們过分地忙于这种工作，竟然忘記这种工作**本身**其实还不是社会民主党的工作，而只是工联的工作。实际上，这种揭露工作只涉及**某一个职业**的工人同老板的关系，而它所得到的成績不过是使出卖劳动力的人学会較为有利地出卖这种“商品”，学会在純粹商业契約的基础上来同劳动力的买主作斗争。这种揭露工作可能（在革命家組織适当地利用这种揭露工作的条件下）成为社会民主党活动的开端和組成部分，但是也可能（而在崇拜自发性的条件下則一定会）产生“純粹工会的”斗争和非社会民主主义的工人运动。社会民主党人领导工人阶级斗争不仅是要爭取出卖劳动力的有利条件，而且是要消灭迫使穷人卖身給富人的社会制度。社会民主党并不是在工人阶级同仅仅某一部分企业主的关系上代表工人阶级，而是在工人阶级同现代社会的各个阶级，同国家这个有組織的政治力量的关系上，代表工人阶级。由此可见，社会民主党人不但不能以經濟斗争为

来同“工人事业”杂志和“工人思想报”上的經濟斗争栏的篇幅的总和比較一下，那他們馬上就会看到，他們在这一方面也是落后的。大概，他們正因为感觉到了这种简单的真实情况，才迫不得已而提出了一些显然是表明他們自己的惶惑不安的論据。他們写道：“‘火星报’不管愿意不愿意(!)，都不得不(!)考慮到实际生活的迫切要求，至少(!!)也得刊載一些叙述工人运动情形的通訊。”（“两个代表大会”第27頁）这真是一个把我們駁得体无完肤的論据！

限，而且不能容許把組織經濟方面的揭露工作当做他們的主要活动。我們应当积极从政治上教育工人階級，发展工人階級的政治意識。**现在**，当“曙光”杂志和“火星报”向經濟主义作了第一次攻击之后，这一点已經是“大家都同意”的了（虽然我們在下面就会看见，有些人只是口头上同意而已）。

試問，政治教育究竟应当有哪些內容呢？是否能单以宣传工人階級与专制制度敌对的观念为限呢？当然不能。只**說明**工人在政治上受压迫是不够的（也像只是向工人**說明**他們的利益与厂主的利益相对立的事实还不够一样）。必須利用这种压迫的每一个具体表现来进行鼓动（正像我們已經开始利用經濟压迫的具体表现来进行鼓动一样）。既然**这种**压迫是落在社会中各种不同的階級的身上，既然这种压迫表现在生活和活动的各种不同的方面，包括职业、一般公民、个人、家庭、宗教、科学以及其他等方面，所以我們如果不**担負起**組織对专制制度的**全面的政治揭露**的工作，便不能**完成**我們发展工人的政治意識的**任务**，这难道不是显而易见的嗎？为了利用压迫的具体表现来进行鼓动，不是应当把这些表现揭露出来嗎（也像为了进行經濟鼓动，应当把工厂里的黑暗现象揭露出来一样）？

看来，这是很明白的吧？但正是在这里我們可以看到，“大家”只是口头上同意必須**全面**发展政治意識。正是

在这里我們可以看到，例如“工人事业”杂志就不仅沒有負起組織（或是提倡組織）全面的政治揭露工作的任务，反而把已經着手实现这个任务的“火星报”**拉向后退**。請听吧：“工人阶级的政治斗争只是”（恰恰不只是）“最发展、最广泛和最切实的經濟斗争形式”（“工人事业”杂志的綱領；“工人事业”杂志第1期第3頁）。“现在摆在社会民主党人面前的任务是要尽量賦予經濟斗争本身以政治性质”（馬尔丁諾夫，“工人事业”杂志第10期第42頁）。“經濟斗争是吸引群众参加积极的政治斗争的最普遍适用的手段”（联合会代表大会決議和“修正案”，“两个代表大会”第11頁和第17頁）。讀者可以看到，所有这些論調，从“工人事业”杂志产生时起，直到最近的“編輯部的通知”为止，始終都貫徹在“工人事业”杂志中，并且这些論調显然都表现着对于政治鼓动和政治斗争的同一个观点。你們可以根据政治鼓动应当**服从于**經濟鼓动这个流行于一切經濟主义者中間的意见来仔細考察一下这个观点。說經濟斗争一般讲来^①是吸引群众参加政治斗争的“最普遍适用的手段”，这是不是正确呢？完全不正确。

① 我們所以說“一般讲来”，是因为“工人事业”杂志上所讲的正是全党的一般原則和一般任务。固然，在实践中，政治有时的确**应当服从于**經濟，但是只有經濟主义者才会在准备应用于全俄各地的決議中說到这一点。其实，也有“从一开始”就“只有在經濟的基础上”才**能够**进行政治鼓动的情形，但“工人事业”杂志終于已經明白这是“根本不必要”的（“两个代表大会”第11頁）。我們在下一章中就要証明，“政治派”和革命家的策略不仅不忽略社会民主党的工联任务，恰恰相反，只有它才能**保証**这种任务彻底实现。

所有一切警察压迫和专制暴行的表现，也是同样能“吸引”群众的一种“普遍适用的”手段，而决不是只有那些同经济斗争相联系的表现才是这种手段。地方官横行不法，农民遭受体刑，官吏贪污受贿，警察欺侮城市的“老百姓”，同饥民作斗争，压制人民追求光明和知识的愿望，勒索赋税，迫害异教徒，虐待兵士，侮辱学生和自由派知识分子，——为什么所有这些事实以及千百种诸如此类的不同“经济”斗争直接相联系的压迫行为，一般讲来就是**較不**“普遍适用的”进行政治鼓动和吸引群众参加政治斗争的手段和緣由呢？恰恰相反，在工人苦于（他们自己或者同他们亲近的人）没有权利，苦于遭受专横和强暴压迫的所有的实际事例中，工会斗争中遭到警察压迫的事例显然只占很小一部分。試問为什么要預先**縮小**政治鼓动的规模，只把**一种**手段称为“最普遍适用的”手段，而否认社会民主党人同时还应当采用其他一般讲来同样“普遍适用的”手段呢？

在很久很久以前（一年以前！……）“工人事业”杂志曾經写道：“經過一次罢工，或者最多經過几次罢工以后”，“当政府一出动警察和宪兵的时候”，“最近的政治要求就会成为群众所能理解的要求了。”（1900年8月第7期第15頁）现在联合会已經把这个机会主义的阶段論推翻而向我們表示让步，說“根本不必要从一开始就只有**在經濟的基础上**进行政治鼓动”（“两个代表大会”第

11 頁)。将来写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运动史的人，只要看看“联合会”这样否认它那一部分旧的錯誤见解的事实，就能比根据任何长篇議論都更加清楚地看到，我們的經濟主义者把社会主义糟蹋到怎样的地步了！联合会該是多么的幼稚，竟以为这样抛弃它的一种縮小政治范围的議論就能促使我們去贊同它的另一种縮小政治范围的議論！如果在这里也說經濟斗争必須尽量广泛地进行，要始終利用經濟斗争来进行政治鼓动，但“根本不必要”认为經濟斗争是**最普遍适用**的一种吸引群众参加积极的政治斗争的手段，这岂不是更合邏輯一些嗎？

联合会以为用“最普遍适用的手段”这个說法来代替犹太工人联盟（崩得）第四次代表大会的相应決議中的“最好的手段”的說法是有意义的。我們实在很难說这两个決議中究竟哪个好些；照我們看来，**两个都很糟糕**。無論联合会或是崩得，都滑到（在某种程度上也許是不自觉地，只是由于受了傳統的影响）經濟主义即工联主义的政治观上去了。至于这里用的字眼是“最好的”，还是“最普遍适用的”，实质上是毫无差別的。假使联合会說“建立在經濟基础上的政治鼓动”是最普遍采用的（而不是“适用的”）手段，那末这对于我們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发展的一定时期來說，就会是正确的。也就是对于 **經濟主义者**，对于 1898—1901 年間的許多（也許是大多数）实际工作者來說，是正确的，因为的确这些做实际工作的經濟

主义者几乎仅仅是在**經濟基础上**采用了（是說他們一般地采用了！）政治鼓动。我們已經說过，“工人思想报”和“自我解放社”也是承认并且介紹过**这种**政治鼓动的！“工人事业”杂志本来应当**坚决斥責**在进行**經濟鼓动**这种有益的事情时縮小政治斗争范围的有害行为，但它并没有这样做，反而把最普遍**采用的**（**經濟主义者**采用的）手段称为最普遍**适用的**手段！无怪乎当我们把这班人称为**經濟主义者**的时候，他們也就只好大罵我們是什么“捏造者”、“搗乱者”、“圣使”、“誹謗者”^①等等；只好向大家哭訴，說这使他們蒙受奇耻大辱；只好用几乎是发誓賭咒的口吻声明說：“现在根本没有任何一个社会民主党組織犯有**經濟主义的錯誤**”^②。啊，这些誹謗者，这些凶恶的人，政治派！整个**經濟主义**不是他們仅仅由于有仇恨人的心理，而故意捏造出来，使人蒙受奇耻大辱的嗎？

馬尔丁諾夫向社会民主党提出“賦予**經濟斗争**本身以政治性质”的任务，这究竟有什么具体的切实的意义呢？**經濟斗争**是工人为爭得**出賣劳动力**的有利条件，为改善工人劳动条件和生活条件而向厂主进行的集体斗争。这种斗争必然是职业性的斗争，因为各种职业中的劳动条件极不相同，所以为**改善**这些条件的斗争，也就不能不按职业来进行（通过西欧的工会、俄国的临时工会联合会

① 这是“两个代表大会”小册子的原話；該小册子第31、32、28、30頁。

② “两个代表大会”第32頁。

和传单等等)。因此,“賦予經濟斗争本身以政治性质”,就等于力争用“立法和行政措施”(像馬尔丁諾夫在他那篇文章的下一頁即第43頁上所說的那樣)来实现这些职业要求,在这种职业范围内改善劳动条件。所有的工会现在是而且向来都是这样做的。你們只要看一看維伯夫妇这两位渊博的学者(和“渊博的”机会主义者)的著作,就可以知道英国的工会早就認識到了并且一直在实现着“賦予經濟斗争本身以政治性质”的任务,早就为罢工自由,为取消法律上对于合作社运动和工会运动的一切限制,为頒布保护女工和童工的法律,为依靠卫生法和工厂法来改善劳动条件等等而从事斗争了。

由此可见,所謂“賦予經濟斗争**本身**以政治性质”这句漂亮話,听起来虽然“极端”深奥,“极端”革命,其实只是掩盖着那种力求把社会民主主义政治**降低**为工联主义政治的传统倾向!他們表面上是說要糾正“火星报”的片面性,說“火星报”“把教条的革命化看得比生活的革命化更重要”^①,而实际上却把**为經濟改良的斗争**当做一种新的东西来款待我們。其实,“賦予經濟斗争本身以政治性质”这句话不过是意味着爭取經濟改良而已。只要馬尔丁諾夫自己仔細分析一下他所說的那些話的意思,那他

^① 见“工人事业”杂志第10期第60頁。在这里,馬尔丁諾夫是用另一种方式来玩弄我們在上面已經描写过的那种把戏,即把“一步实际运动比一打綱領重要”这一論点应用到我国运动现在的这种混乱状态中来。其实,这只是把伯恩斯坦所說的“运动就是一切,最終目的算不了什么”这句有名的話翻譯成俄文罢了。

自己就可以作出这个简单的結論。馬尔丁諾夫拖出了他的一門最重的大炮来反对“火星报”，他說：“我們党能够而且应当向政府提出具体要求，要它实行种种立法和行政措施来反对經濟剝削，消除失业现象，消除饥荒等等。”（“工人事业”杂志第10期第42—43頁）具体要求政府实行种种措施，这难道不正是要求实行社会改良嗎？我們现在要再一次問問沒有偏見的讀者：当工人事业派（恕我使用这个笨拙的流行名詞！）提出必須爭取經濟改良这个論点来表明他們同“火星报”的**意見分歧**的时候，我們称他們为暗藏的伯恩施坦主义者，这是不是誣蔑了他們呢？

革命的社会民主党过去和现在都把爭取改良的斗争包括到自己的活动范围之内。但是它利用“經濟”鼓动，并不仅仅是为了要求政府实行种种措施，而且是（并且首先是）要求政府不再成为专制政府。此外，革命的社会民主党认为它**不仅**应当根据經濟斗争，而且应当根据社会政治生活方面的一切现象来向政府提出这个要求。总之，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使爭取改良的局部斗争服从于爭取自由和爭取社会主义的整个革命斗争。而馬尔丁諾夫却不过是用另外一种形式把阶段論复活起来，硬要使政治斗争一定按所謂經濟的道路发展。他在革命高涨时提出爭取改良的所謂特殊斗争“任务”，就是把党拉向后退，而助长“經濟派的”和自由派的机会主义。

其次，馬尔丁諾夫羞羞答答地用“賦予經濟斗争本身

以政治性质”的漂亮的論点来掩飾爭取改良的斗争，而把**仅仅是經濟方面的**（甚至仅仅是工厂方面的）**改良**当做一种特殊的東西提出来。他究竟为什么要这样做，我們不得而知。也許是由于一时疏忽吧？但是，如果他所指的不只是“工厂方面的”改良，那末我們刚才所引过的他那个論点就会毫无意思了。也許是由于他以为政府只是在經濟方面才可能实行和大体上会实行“让步”吧^①？如果是这样，那就是一种很奇怪的謬见了，因为政府在笞刑、身分証、贖金、教派、书报检查制度等等問題的立法方面，也可能作并且确实作过让步的。“經濟方面的”让步（或者假让步），在政府看来自然是最便宜最有利的事，因为它想借此博得工人群众对它的信任。但是，正因为如此，所以我們社会民主党人无论如何也绝对**不应当**使人們得出这样一种看法（或发生这样一种誤解），以为我們是把經濟改良看得更有价值，以为我們正是把这种改良当做特別重要的东西看待等等。馬尔丁諾夫在解释他上面提出的那些关于立法和行政措施方面的具体要求时說道：“这种要求，不会成为一种空話，因为这种要求既然能产生某些显著結果，就能获得工人群众的积极支持……”我們可不是經濟主义者！我們不过是像伯恩施坦先生、普罗柯波維奇先生、司徒卢威先生、尔·姆·先生以及

① 第43頁上說道：“自然，我們之所以劝工人向政府提出某种經濟要求，是因为在**經濟**方面，专制政府由于必要而愿意作某些让步。”

tutti quanti^①一样奴隶般地崇拜那些具体结果的“显著性”而已！我們不过是（同納尔苏修斯·土波雷洛夫一起）向大家暗示說：所有不“能产生显著结果”的东西都是一种“空話”！我們不过是要大家知道仿佛工人群众不能够（仿佛工人群众——不管人們怎样把自己的庸俗思想加到他們头上——并没有已經証明自己能够）积极支持对专制制度的任何反抗，支持那些甚至絕對不能产生任何显著结果的反抗！

就拿馬尔丁諾夫本人所援引的那些关于消除失业和消除饥荒的种种“措施”的例証來說吧。“工人事业”杂志致力于——根据它自己的諾言来看——拟制和詳細制定“能产生显著结果”的“立法和行政措施方面的具体（以法案的形式嗎？）要求”，而“火星报”却“始終把教条的革命化看得比生活的革命化更重要”，极力說明失业现象与整个資本主义制度有不可分的联系，警告大家說“饥荒已經发生”，揭露警察“同饥民作斗争”的行为和可恶的“暫行苦役条例”；同时“曙光”杂志又把論述饥荒問題的一部分“內政評論”^②印成了单行本的鼓动小册子。可是，天哪，这班狹隘得不可救药的正統主义者，这班对“生活本身”的要求熟視无睹的教条主义者又是多么“片面”呵！他們的任何一篇文章都沒有提出（这还了得！）任何

① 諸如此类的人。——編者注

② 见“列宁全集”1959年人民出版社版第5卷第223—241頁。——編者注

一个，的确确是没有提出任何一个“能产生显著结果”的“具体要求”！这班教条主义者是多么可怜呵！应当叫他们到克里切夫斯基之流和馬尔丁諾夫之流那里去領教領教，好让他们懂得策略是同什么什么一起发展的什么什么增长的过程，好让他们懂得必須賦予經濟斗争**本身**以政治性质！

“工人对厂主和政府作經濟斗争（“对政府作**經濟**斗争”！！），除了它的直接的革命意义之外，还有一种意义，就是它能使工人經常感到他們沒有政治权利这个問題。”（馬尔丁諾夫，第44頁）我們把这段話抄下来，并不是要把上述那些反复說过千百次的东西再拿来重复一次，而只是要来对馬尔丁諾夫特別表示感謝，因为他发明了所謂“工人对厂主和政府作經濟斗争”这样一个新鮮而出色的公式。說得真是妙极了！真是以独到的天才，极其巧妙地抹掉了各經濟主义者間的一切局部的分歧和細微的差別，而用簡單明了的話表明了經濟主义的**全部实质**，——开始是号召工人作“政治斗争以維護共同的利益，即改善全体工人的状况”^①，接着是大談阶段論，最后是在代表大会決議上說什么“最普遍适用”等等。“对政府作經濟斗争”也就是工联主义的政治，而工联主义的政治却同社会民主主义的政治相去十万八千里。

① “工人思想报”，“附刊”第14頁。

(二) 馬尔丁諾夫究竟怎样加深了 普列汉諾夫的意见

有一位同志說：“近来我們社会民主党人中間真是出现了不少罗蒙諾索夫！”他指的是，許多傾心于經濟主义的人都有一种十分奇怪的傾向，总想“凭自己的头脑”发现一些伟大的真理（例如說經濟斗爭将使工人碰到无权問題），同时又用天生才子不可一世的态度鄙弄所有先前的革命思想和革命运动发展过程已經提供的一切。馬尔丁諾夫就是这样的一位天生的罗蒙諾索夫。你們只要瞧瞧他所写的“当前問題”一文，就能看出他在怎样“凭自己的头脑”研究那早已經由阿克雪里罗得說过了的东西（关于阿克雪里罗得这个名字，我們的罗蒙諾索夫当然是完全保持緘默的），就能看出例如他已經在开始了解我們决不能忽視資产階級中某些阶层的反政府态度这种道理（“工人事业”杂志第9期第61、62、71頁；并参看“工人事业”杂志編輯部对阿克雪里罗得的“回答”；該杂志第22、23—24頁）等等。但可惜只是“在研究”和只是“在开始”，仅仅如此而已，因为他毕竟还根本沒有了解阿克雪里罗得的意思，所以他还在說什么“对厂主和政府作經濟斗爭”。在三年之久的時間內（1898—1901年），“工人事业”杂志一直在努力了解阿克雪里罗得的意思，然而——然而毕竟还是沒有了解这种意思！也許这也是由于社会

民主党“也像整个人类一样”始終都是只向自己提出能够实现的任务吧？

但是罗蒙諾索夫之流的特色，不仅表现在他們对于許多东西都不知道（如果只是这样，那不过是一种小不幸！），并且还表现在他們不認識自己的无知。这才是一种大不幸，正是这种大不幸促使他們馬上就来着手“加深”普列汉諾夫的意见。

罗蒙諾索夫-馬尔丁諾夫写道：“自从普列汉諾夫写了这本书（“俄国社会主义者在与饥荒的斗争中的任务”）以后，已經过去許多时候了。社会民主党人在十年中間虽然領導了工人阶级的經濟斗争，但是他們……还没有能給党的策略奠定一个广泛的理論基础。现在这个問題已經成熟了。我們如果愿意奠定这样的理論基础，显然就应当大大加深普列汉諾夫曾經闡发过的那些策略原則…… 我們现在对于宣传和鼓动的区别，应当作出一个与普列汉諾夫所作的不同的定义”（馬尔丁諾夫在前面刚刚引用了普列汉諾夫的話：“宣传員給一个人或几个人提供許多观念，而鼓动员却只提供一种或几种观念，但是他把这些观念提供給一大群人”）。“我們认为宣传就是用革命精神來說明整个现存制度或其局部表现，——至于在宣传时所用的形式是能为几个人还是能为广大群众所了解，那是没有什么关系的。所謂鼓动，严格讲来（原文如此！），我們却认为是号召群众去作某种具体行动，是促进无产阶级对社会生活进行直接的革命的干預。”

我們真应当为俄国的，而且为国际的社会民主主义运动获得了馬尔丁諾夫所发明的这一套更严格更深奥的